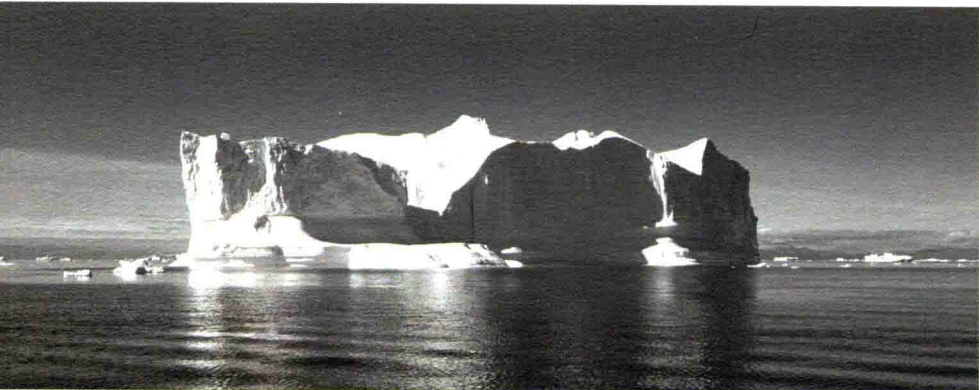


On the Political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论政治的本性

【英】尚塔尔·墨菲 (Chantal Mouffe) 著 周凡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ROUTLEDG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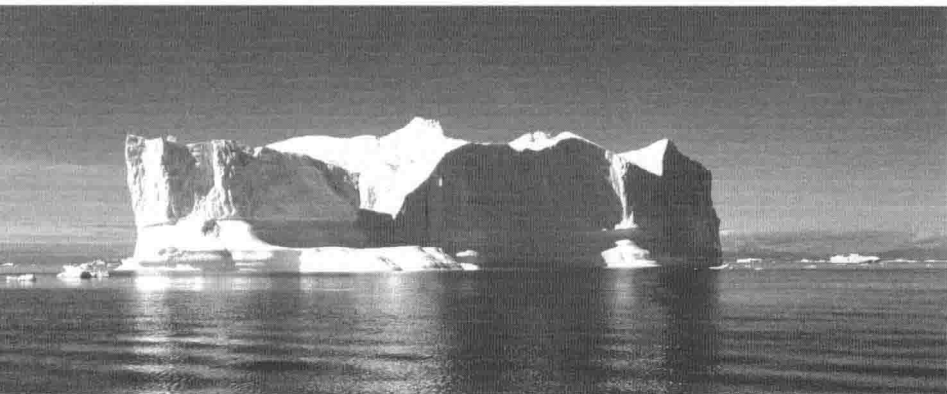
PHOENIX LIBRARY

On the Political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论政治的本性

【英】尚塔尔·墨菲 (Chantal Mouffe) 著 周凡·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PHOENIX LIBR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政治的本性/(英)墨非(Mouffe, C.)著;周凡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6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书名原文:On the Political
ISBN 978-7-214-13248-2

I. ①论… II. ①墨… ②周… III. ①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7529 号

On the Political

First Published in 2005 by Routledge

© 2005 Chantal Mouffe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9-003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论政治的本性

著 者 [英]尚塔尔·墨菲

译 者 周 凡

责任编辑 戴亦梁

责任校对 陈 颖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插页 4

字 数 18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3248-2

定 价 3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译者的话

墨菲的《论政治的本性》(2005)出版的第二年,齐泽克和拉克劳分别发表长篇论文——《抵制民粹主义的诱惑》、《为什么建构人民是激进政治的主要任务》——相互攻击、诋毁,这成为2006年西方激进左派理论界中最具震撼性的事件。在《抵制民粹主义的诱惑》一文中,齐泽克对拉克劳穷追猛打并且上纲上线,他不断暗示人们,拉克劳对民粹主义的执著似乎潜藏着默认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逻辑的巨大危险。齐泽克或许没有意识到,这种暗示完全建立在对拉克劳阐述的“民粹主义理性”的深度误解的基础上:拉克劳把民粹主义逻辑接合到自己的政治理论架构之中,其宏旨要义并不是抛弃早先的激进民主概念,恰恰相反,是为了进一步将民主激进化。令人颇为费解的是,齐泽克虽然在《抵制民粹主义的诱惑》中对拉克劳极尽贬抑之能事,但是他对拉克劳的终身合作者尚塔尔·墨菲却表示了最大的善意:

似乎尚塔尔·墨菲的著作在这里更为恰当,她大胆尝试把民主和抗争精神融合起来从而避免了两个极端:一方面,颂扬英雄式的对决(struggle-confrontation)会中止民主及其主要规则(尼采、海德格尔和施米特);另一方面,在民主空间里排除真正的斗争,结果剩

下的只是贫血的、规则操作下的竞争(哈贝马斯)。就此,墨菲正确地指出,借着以报复的方式排除那些不能适应非强制性交际规则的人,暴力又卷土重来……民主似乎不仅能够包含对抗,而且它是主动要求对抗的介入、把对抗作为先决条件并将对抗加以体制化的唯一政治形式,其他政治体制视为威胁的东西(缺乏“天然的”权力占据者),民主却将之提升为其“正常”运作的积极条件:权力之位本身是空的,并不存在天然的权力占有者,论战或者斗争终究不可取消,每一个建设性的政府都必须经过斗争决出、以斗争的方式获得。^①

这种有意把墨菲与拉克劳分开的做法并非齐泽克的发明,早在2003年马克·温曼就在《拉克劳抑或墨菲?》(2003)一文中对“拉克劳和墨菲”这一习以为常的“并置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拉克劳与墨菲的政治思想的差异是那样的显著以至于不可能把他们的思想看作是具有内在连贯性的统一体,他号召人们务必把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与墨菲的“激进多元民主”分离开来。

拉克劳把各种特殊主义的斗争形式征用到体现普遍性的永久企图这一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必要作用之中,他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对个人自由的冒犯。这是拉克劳挪用他曾经遭遇的传统左翼思想——总体范畴的拜物教以及对“纯粹特殊主义”的藐视——的结果。墨菲的激进民主多元主义则完全不同。我们看到,墨菲的著作涉及的是维护、提高特殊主义团体的权利,这来自于一种把隐喻性替代活动作为基本原则确立起来的接合逻辑,即形成对“共和”的集体性关切。墨菲晚期著作的意义就在于为霸权而斗争,就在于为创建一种共同体(community)——而不是社会(society)——而

^① Slavoj Zizek,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32, No. 3, Spring 2006, pp. 558 - 559.

斗争。^①

如果试图把墨菲与拉克劳分开,仅仅指出两者言说“部位”及具体“论题”的差异是远远不够的,这或许只是一种分工或风格上的不同,而不是思想内核本身的悬殊。不论是马克·温曼还是齐泽克,要把墨菲与拉克劳从理论上加以区隔,就必须面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同为政治理论家的拉克劳与墨菲,他们政治思想的本体论基础是截然不同的吗?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分道而行”的吗?遗憾的是,马克·温曼和齐泽克都避开了这个问题。比较而言,齐泽克故意的成分似乎更加明显,因为齐泽克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出版不久,就专门撰写了一篇评论,即后来首次发表于《关于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1990)中的《超越话语分析》,在该文中,齐泽克为对抗概念增补了拉康主义的内涵。在论及《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对抗概念时,他总是说“拉克劳与墨菲”如何如何,比如,“为什么要强调拉克劳与墨菲的对抗概念与拉康的实在概念之间的类同性呢?”“拉克劳与墨菲对对抗概念的精心阐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从拉克劳与墨菲的用语的意义上,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抗关系”,等等。^②既然齐泽克早就知道对抗概念是拉克劳与墨菲的共同财富,那么2006年,他为什么突然就忘了呢?

与齐泽克的健忘症不同,马克·温曼显然是眼光出了问题。撇开“拉墨差异论”不说,单就齐泽克对墨菲的政治思想的把握而言,他的论述还是切中肯綮的,因为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墨菲政治理论的内在张力与核心关切,并且十分精准地道出了墨菲政治哲学的奠基性概念——作为政治之先决条件的对抗。而马克·温曼根本无视新的对抗观念在墨菲政治思想中的作用,通过把《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阐释社会对抗的第

① Mark Anthony Wenman, “Laclau or Mouffe? Splitting the Difference”,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2003, Vol. 29, No. 5, p. 601.

② See Slavoj Žižek, “Beyond Discourse-Analysis”, in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pp. 249 - 251.

三章归之于拉克劳、将论述激进多元民主的第四章归之于墨菲，他草率地把墨菲的政治思想说成是“市民共和主义与捍卫自由主义的政治混合物”^①。令人吃惊的是，在他试图把墨菲与拉克劳完全分开的那篇文章中，对抗概念一次也没有出现。只要粗略地读一下《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就会知道，对于对抗概念的阐述，在该书中前后出现过两次：一次是第三章，另一次是在第四章。即便采纳马克·温曼的分割法，他也必须进一步解释，拉克劳在第三章对对抗的界说与墨菲在第四章对对抗的论述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这一点，马克·温曼是绝对做不到的。他能做到的只是在不谈对抗的前提下对墨菲的政治理论进行武断的定性，岂不知，这种把对抗从墨菲的理论架构中移出的做法构成了对墨菲整体政治理论的致命的阉割。没有对抗就没有政治，这是墨菲的政治宣言，就此而论，没有对抗也就没有墨菲的政治理论。在此，我试图证明的是，不论是在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时期，还是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抑或是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之后，对抗概念一直在墨菲的政治理论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它从边际背景走向理论重建的中心，它从矛盾的一种尖锐形式升格为矛盾的替代物，它从中介性的论证概念发展为终极性本体论范畴。可以说，只有完整透视墨菲思想发展中“对抗”的痕迹，我们才能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她的晚期著作《论政治的本性》的意义。

一

2014年4月13日拉克劳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墨菲从此失去了生活上的伴侣和事业上的合作者。后马克思主义的“双子座”如今只剩一人，现在是到了向墨菲这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奉献特别沉思的时候了。马克·温曼和齐泽克过于急躁，以至于都在错误

^① Mark Anthony Wenman, “Laclau or Mouffe? Splitting the Difference”,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2003, Vol. 29, No. 5, p. 581.

的时间做了错误的事情。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最好不要去言说，而对于不可分开的东西，最好也不要分。即便是对墨菲的专论，也仍然无法绕过拉克劳，他们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以至于略去一个就不能完整地谈论另一个。关于对抗概念，亦是如此。从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看，在1970年代，无论是拉克劳通过普兰查斯对“接合”的研究，还是墨菲通过葛兰西对“霸权”的探讨，都还没有涉及对抗概念的“重述”问题。拉克劳与墨菲的理论介入最初是在阿尔都塞主义的问题域之内，虽然他们从1970年代中后期决定转向葛兰西主义，但是阿尔都塞主义对他们的影响并没有随着葛兰西主义的引入而完全消散。1977年11月——即拉克劳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出版不久——阿尔都塞在意大利《宣言报》主办的“后革命社会的权利与对抗”威尼斯研讨会上提交了论文《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在这篇著名文章中，阿尔都塞号召他的读者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有别于崩溃与死亡的完全不同的意义”，从而“在这种危机中并通过这种危机把马克思主义中有生命力的、活的东西释放出来”。^① 在1970年代后期的法国，由于后结构主义的崛起，阿尔都塞的这一号召不可能得到人们的响应。可是，在英国，阿尔都塞主义的退潮较为滞后——比如，时至1975年，巴里·欣德斯和保罗·赫斯特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书中仍然致力于捍卫阿尔都塞主义的有效性。就拉克劳与墨菲而论，他们在1970年代中后期所做的工作也只是用葛兰西主义来“限制”阿尔都塞主义或者说削弱阿尔都塞主义坚硬的阶级主义，而并不是彻底抛开阿尔都塞主义，正因如此，台湾学者陈宜中将1970年代中后期拉克劳与墨菲的理论立场定位为“后阿尔都塞主义/新葛兰西主义”。^② 在后阿尔都塞主义的理论境遇中，在英国左派退出阶级政治和阶级理论已成大势的背景下，阿尔都塞提出的

① See Louis Althusser, “The Crisis of Marxism”, in P. Camiller trans., *Power and Opposition in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London: Ink Links, 1979, p. 225.

② 参见陈宜中《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英国后马克思主义评析》，载黄瑞祺主编《马学新论》，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8年，第50页。

“化危为机”的号召引起了拉克劳与墨菲的强烈共鸣。

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不因“退出阶级”而消亡，如何使马克思“总是向群众斗争那无法预言的历史的要求开放”，^①这是1980年代初拉克劳与墨菲的主要理论关切。在他们正式合作的第一宣言——发表于1981年1月的《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上的文章《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的开头，他们开始尝试对阿尔都塞的“危机与变革”问题作出自己的反思。

将其中心定位于阶级斗争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已经很难适应纷纭而现的各种新矛盾，如今，这些新矛盾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主义斗争发生作用的领域。为了探讨那些具有反资本主义性质而其同一性却不是围绕特定的“阶级利益”建构出来的新的政治主题——女性的、民族的、种族的、性偏好的、反核的以及反体制的种种运动——在何种程度上，修改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成为必要？^②

自1968年的“五月风暴”以来，新社会运动的声势日益壮大，这些运动不再能被归结为无产阶级运动，它的主体不是无产阶级，并且它的目标也不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些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统治的大众政治运动正在使传统马克思主义陷入尴尬的境地。传统马克思主义特选的反抗主体不再反抗，而发出反抗之声的却是一些“局外人”。对于左派来说，应对之策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在原地乞灵招魂，寄希望于丧失阶级意识的主体在某个必然的时刻突然醒来；一种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反抗资本主义的阵地，把这些看来各不相干的反抗点巧妙地串连起来。拉克劳与墨菲选择的是后一条道路，在论述“社会运动的自治”的那一节中他

^① 参见[法]阿尔都塞《今日马克思主义》，参见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页。

^②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Socialist Strategy, Where Next?” *Marxism Today*, January 1981, p. 17.

们明确了自己的任务：

这些表达新的对抗(the new antagonisms)的各种不同要求如何能够在不限制其特性并同时维持其自治的情况之下被接合(articulated)起来呢？对于阐发当前社会主义战略所需要的新的霸权观念(new conception of hegemony)，毫无疑问，这就是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并且它的解决绝非易事。^①

正是在明志宣誓般的庄严中，对抗概念出场了——这是新概念的出场，是与接合概念、霸权概念第一次联袂出场，正是由于这三个概念一同出场，我们才可以说，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完成了。在《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的末尾，两位作者宣称：“现在是到了与那种认为**所有对抗皆已消失**的完全同质化的社会主义观念告别的时候了，是到了应该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以真正民主的方式**化解对抗**的社会形态的时候了”^②。新社会运动激发了拉克劳与墨菲重构社会主义战略的热情与灵感，在他们看来，问题在于把那些被传统马克思主义排除在外的各种各样的新的对抗形式纳入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这当然是一次深刻的变革，抑或像阿尔都塞说的那样，是一次“生死攸关的赌注”：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生，我们不仅要清算马克思从前的信仰，而且要让马克思主义自己“了解那个事实上的和将要改变的自己”。^③充分尊重形态各异的新的对抗形式，势必就要取消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工人阶级基于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而产生的反资本主义的对抗加以特权化，如此一来，就没有被“客观社会规律”所预定的天然的“领导阶级”，何种反抗主体居于“主导地位”，这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斗争能力特别是“接合能力”，也就是

①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Socialist Strategy, Where Next?” *Marxism Today*, January 1981, p. 22.

②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Socialist Strategy, Where Next?” *Marxism Today*, January 1981, p. 22.

③ 参见[法]阿尔都塞《今日马克思主义》，参见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265页。

说,所谓的“霸权”是在“接合”各种不同的“对抗形式”的过程中建构出来的。没有“新的对抗”,何来“新的霸权”?“对抗”是一个服务于“霸权目的论”的中介概念——阐述新的对抗形式无非是为了引出新的霸权构型。就新的对抗处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并且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来说,《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对抗概念主要是来**对抗**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陈旧对抗模式——新的对抗及其接合方式的新构造必然导致拉克劳与墨菲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边界而走向后马克思主义地带。

“新的对抗”的发现直接促成了拉克劳与墨菲的一系列概念——接合、霸权、民主、社会主义等——的功能升级从而将他们的理论建构引向全新的方向,也正因如此,在整个后马克思主义转向时期以及《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在论及对抗概念时,拉克劳与墨菲总是着意突出对抗之“新”,《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第四章第2节的标题就叫“民主革命与新的对抗”,第三章第4节在论述对抗时,字面上虽然没有称为“新的对抗”,但是关于对抗的界说已完全告别了旧规定,并且,在开始引入对抗与矛盾的区分时,他们特别加了一个注释——第三章的“注释40”: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不同于本书作者之一在其早期作品中表达的观点,在那里——欧内斯托·拉克劳发表于《影视教育》(1980年春)上的《民粹主义的断裂与话语》——对抗概念被矛盾概念所同化。在重新思考我们早期的观点方面,埃米利奥·德·艾波拉(Emilio de Ipola)在多次谈话中所提出的批判性评论是大有裨益的。^①

“新的对抗”之“新”不仅标示了一种新的理论建构的地平线,而且表明了旧的对抗的存在以及宣誓主体迷失在旧的对抗图景之中的经验史。

^①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48.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第三章第4节“对抗与客体性”的开头中，拉克劳与墨菲以一个设问句来描述对抗的经验：“现在，我们应当自问的是，有没有这样一些‘经验’、这样一些话语形式：通过它们而显现的不再是‘先验所指’的继续延宕，反而是这一延宕的空洞无用、任何稳定差异的不可能性、‘客体性’的最终不可能性？答案是：有。限制任何客体性的这一‘经验’确实有一种话语显现形式，这就是对抗”^①。安德鲁·诺斯猜测，在这里，“经验”一词被加上引号，“可能暗示着某种神秘的经验”^②，其实，对抗的经验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不妨说，这里描述的就是1981年初他们下决心终止旧的对抗经验继续延宕的心路历程，而从《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到《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一系列文本也就是对抗“旧的对抗”的经验和话语形式。“新的对抗”宣告了“旧的对抗”的消失以及确保旧的对抗形态的“先验所指”的退场。

应该说，“注释40”表述的方式和语气更像是出自墨菲而不是拉克劳。我们知道，拉克劳最初是通过墨菲接触到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拉克劳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1977）中的第三篇文章——《法西斯主义与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到霸权概念时作了一个很长的注释，在这个注释中他特意提道：“霸权概念，就如葛兰西界定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中是一个关键概念，它的全部意义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挥。在这个场合，我们不能展开对它的分析，但是我想基于尚塔尔·墨菲在她的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所作的阐述作几点评论”^③。墨菲的“尚未发表的文章”就是收入1979年墨菲主编的《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部文集集中的《葛兰西的霸权与意识形

①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2.

② Andrew Norris, "Against Antagonism: On Ernesto Laclau's Political Thought", *Constellations*, Vol. 9, No. 4, 2002, p. 555.

③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41.

态概念》一文。^①虽然墨菲的《葛兰西的霸权与意识形态概念》的发表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晚,但实际上,它早在后者出版两年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拉克劳正是在读了墨菲的这篇关于霸权概念的文章之后才写出《法西斯主义与意识形态》这篇阐述“接合(articulation)”的文章的。没有与墨菲的结合,或许就没有拉克劳的“接合”概念,我们不妨读一下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导论中的最后一句话:“我必须向尚塔尔·墨菲致以深深的谢意,我和她详细地讨论了这些文章的主要部分,她对于一些核心观点的阐发所做出的贡献具有如此决定的意义,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它们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联合探险”^②。

在对“霸权”的“联合探险”中,墨菲是走在前头的。这让人禁不住产生一种类推:新的对抗概念原本也是墨菲最先提出的,正是在墨菲的建议下,拉克劳才放弃了他“早先的观点”,而这种“放弃”是至关重要的——不做出这种“放弃”,就很难超越葛兰西。退一步讲,即便不承认对抗概念是墨菲最先提出的,我们也没有理由否认它是拉克劳与墨菲合作的产物。《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第三章的“注释40”明确地道出了两点:其一,对对抗概念的新阐释是拉克劳与墨菲共同的意见,而并非某一个人的观点;其二,拉克劳在1980年春天的时候仍然是在矛盾的意义上使用“对抗”一词,也就是说,拉克劳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概念转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概念发生在他与墨菲开始对新社会运动加以理论化的时期。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墨菲对于《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的对抗概念所做出的贡献。拉克劳把自己独著的著作尚且视为与墨菲合作的产物,而马克·温曼却在他们真正合写的著作中把这两个“合伙人”的思想对立了起来,这是说不过去的。

① Chantal Mouffe (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p. 168 - 204.

②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1977, p. 13.

二

在《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1981)与《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1985)之间,墨菲有两篇论述“新的对抗”的文章值得特别重视。一篇是墨菲1983年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提交的论文,后来以“霸权与新政治主体:走向一种新的民主概念”为题发表于加利·纳尔逊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1988年主编的文集《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阐释》^①中,另一篇是发表于1984年的《重思马克思》辑刊中的短文《走向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阐释》^②。这两篇文章的主题、论点及论证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在内容上也有交叉。《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第四章第2节“民主革命与新的对抗”就是基于这两篇文章的一种扩写。由于《霸权与新政治主体:走向一种新的民主概念》篇幅稍长,论证更为详细,所以此处的讨论主要围绕这篇文章展开。^③

《霸权与新政治主体:走向一种新的民主概念》与《走向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阐释》一样,探讨的是新社会运动表达的“新的对抗”。整篇文章围绕“新的对抗(new antagonisms)”铺开,除了前面关于“理论立场”的概述外,其他三个部分的小标题——“新的对抗与统治形态”、“新的对抗与民主斗争”、“新的对抗与社会主义”——一概不离“新的对抗”这一关

①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New Political Subjects: Toward a New Concept of Democracy”, 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ed.),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89 - 101.

② Chantal Mouffe, “Towards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Sakari Hanninen and Leena Paldan (ed.), *Rethinking Marx*, New York and Bagnolet, International General/IMMRC, pp. 139 - 143.

③ 汉语学界对墨菲的《霸权与新政治主体:走向一种新的民主概念》一文的探讨较早,1990年12月《当代》(第56期)中陈宜中的文章《人民民主与台湾的辩证》、1991年6月《当代》(第62期)中何方的文章《政治民主、拉克劳与慕芙》针对墨菲这篇文章提出的新的民主观念进了激烈的争论,遗憾的是,他们主要借墨菲的文章大谈台湾“社运”与“政运”的关系,从而偏离了墨菲这篇文章的要旨。

关键词。在文章的开头，墨菲交待，她打算在这篇文章中探讨如下几个问题：（1）新社会运动表达什么样的对抗以及这些对抗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什么联系？（2）这些斗争对于我们的民主概念具有怎样的意义？（3）如何把这些对抗置于社会主义的战略之中？

首先，墨菲指出，新社会运动表达的是对“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支配形态的一种对抗。这种支配形态包含三方面的特征：以半自动化流水生产线为基础的劳动过程、凯恩斯式的干预主义国家、由媒体主导的大众文化。第一个特征的后果是社会活动的全盘商品化，第二个特征的后果是官僚化的扩展，第三个特征的后果是文化模式的单一化和生活方式的同质化。“不论引发对抗的是社会需要的商品化，还是国家官僚主义，抑或是文化的均一化以及对传统价值的破坏，所有这些对抗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问题并不由个体在生产体系中的确定位置引起，因此它们都不是‘阶级对抗(class antagonisms)’”^①。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是左翼激进主义的新征程，那么，这一新征程就是对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新变化所带来的新社会运动的一种理论回应。一如伊萨克所言，“这些运动所表达的对抗，尽管从历史上讲并不是全新的，但是他们抒发的特定的不平、它们的独特表达形式无不带有战后社会与政治发展的痕迹”^②，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就是对这些抒发社会抱怨、政治不满和文化抵制的种种新对抗形式向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其核心在于如何看待非阶级关系并将其概念化——的一种反本质主义、反决定论、反还原论的解决。

其次，墨菲以鲜明的层次感在从属(subordination)与对抗、对抗与斗争(struggle)之间作出了重要区分。对抗因抵制从属与不平等关系而

①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New Political Subjects: Toward a New Concept of Democracy", 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ed.),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 93.

② Jeffrey Isaac, *Power and Marxist Theory: A Realist View*,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08.